



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

宫力 朱地 陈述 著



Mao Zedong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

宫力 朱地 陈述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宫力,朱地,陈述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51-2458-5

I. ①毛… II. ①宫… ②朱…③陈…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4411号

书 名 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
著 者 宫力 朱地 陈述

出 品 人 高海浩
总 监 制 徐永新

选题策划 万方正
责任编辑 万方正 张佳彬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727
E-mail hongqi1608@126.com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编 辑 部 010-64038529
发 行 部 010-64024637
项 目 部 010-84026619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1/16
印 张 19.5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2458-5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引言

一位哲学家曾这样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对此深以为然。

在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之后,时代就呼唤着这样的伟大人物,以唤起民众,将中华民族从危机之中拯救出来。正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一批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如洪秀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这些站在(或曾经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由黑暗走向光明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而在这些人物中,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为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没有人能担得起这样的评价。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比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最早地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呢?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呢?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毛泽东的一生,就不难发现,这与毛泽东的显著特点是分不开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此后,注重实际、注重调查、注重读“无字书”,就成为贯穿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条主线,成为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正因为毛泽东能够坚持从中国的实际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以,在若干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总是能够透过层层迷雾,认清前进的方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但是,毛泽东个人的重大作用又不是孤立地实现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他的个人智慧与党的集体智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离开了党的集体领导,任何个人都难以有大的作为。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全体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他指出,个人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使共产党人少犯错误。他曾经把个人专断比作“泥坑”,尖锐地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①可见,依靠集体智慧是毛泽东能够发挥杰出作用的前提。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其晚年曾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国家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但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人们将永远怀念他对中华民族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以若干重大历史关头作为背景,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位历史巨人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①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第一章

在“五四”大潮中初露锋芒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划分的界标，也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起点。在这个大变动时期，毛泽东第一次发挥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

青年毛泽东胸怀大志，努力研究各种学说，以其出众的才华赢得师生的赞誉，也奠定了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发挥作用的基础

19 世纪中叶之后的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国家主权丧失，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民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 20 世纪的。但是，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勤劳智慧的民族，从没有甘心忍受这种屈辱的生活。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和斗争。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黑暗和愚昧。但多次努力，包括诸如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力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起自下层的并有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抱恨终身。

伟大的辛亥革命，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影响和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但是，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者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旧的道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随后，一批先进思想家们开始



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于是,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这个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正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深受陈独秀等主办的《新青年》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这一著名的文学复兴刊物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读这一刊物,十分敬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取代了我已经摒弃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我的榜样。”^①

这时毛泽东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混合而成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思想和老式的自由主义,都怀有某种模糊的向往,但我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②这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他在努力研读各种学说,在众多学说中苦苦探索真理,选择道路。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了突出的才能,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大量的知识,并注意独立思考。他认为: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他学习的目的明确,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得出了救国必须有本领的结论。他十分讲究学习方法,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毛泽东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2号上,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③的名言。

青年毛泽东从不死读书。他积极参加所能进行的社会实践,十分关心时事政治。他曾回忆说:“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④他经常就一些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如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等发表演讲。在一师读书期间,他参加仇日反袁的活动;组织一师学生举行了一次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主持过第一师范的学友会;主办过工人夜学等等。

在此期间,能反映出毛泽东雄才大略的事件,是他成功地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部分北洋军阀败兵的枪支。据毛泽东的同学周世

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70页。

④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页。

钊回忆,北洋军第八师王汝坚的部队,由株洲、湘潭一线向长沙溃退时,在离长沙只有两里路时,由于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溃兵的情况后,觉得可以把他们赶走。他急忙组织学生志愿军中胆子比较大的同学约200人,用平时上操用的木枪,潜伏于校后的妙高峰上。又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兵伏在最前列,在溃兵向北进的时候,毛泽东在溃兵靠近时,便要警察在山头鸣枪,学生们放爆竹,溃兵不知虚实,不敢抵抗,派人来交涉后,真的缴了枪。并由长沙商会出钱,遣走了事。事后,全校沸腾般地议论这件事,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毛泽东在同学中的威望又大大提高。

毛泽东不仅在同学中有极高威望,他的老师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和品行。杨昌济在他的日记中曾写到: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① 杨昌济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说:毛泽东和蔡和森“二人是海内的人才,前程远大”,他还说:“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②徐特立、王季范、黎锦熙等老师也曾称赞过毛泽东。

从一则奇特的“征友启事”到成立新民学会

1915年暑假后,湖南省长沙市各学校同时出现了一则引人注目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这份启事是用兰亭帖体书写、八裁湘纸油印的,主要内容是征求刻苦耐劳、意志坚定、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最末一句为“愿嚶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取《诗经》中“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意。当时的长沙,还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内地城市,这则启事可以说是一种标新立异之举。所以,人们都感到奇怪,纷纷猜测,这位“二十八画生”是谁?这则启事的意图又是什么?这则“征友启事”张贴到长沙省立女师的校园后,引起女师校长的警惕。他平时不让女学生与外界有联系,更不准结交男朋友,这位“二十八画生”会不会是别出心裁,用这种方法来找恋爱对象?于是,女师校长按照启事的落款地址,来到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打听,才了解到这位“二十八画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发出的启事,根本就不是为了找什么女朋友。女师校长至此才放下心来。

①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蔡和森烈士传略》,载《新湘评论》1979年第10期。

这位“二十八画生”就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28画)。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目睹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他很早就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改造旧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曾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以诗言志,表达了自己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决心。在求索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要实现改造社会这一目标,只靠一个人或几个人是不行的,“亲师而外,取友为急”,必须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形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共同奔赴这一目标,才能有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才发出了上述的“征友启事”。当然,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能理解这种举动,这次征友并不顺利,按毛泽东的话说,他征求到“三个半”朋友。但是,通过这次征友和以后的不断努力,毛泽东团结了一批同学,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了一个团体”。1917年冬,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组织学会,取名为“新民学会”,以体现其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和为人民的思想。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蔡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女校的合影。后排左4为毛泽东。

和森、何叔衡、罗章龙、萧子升、萧三等 13 人到会，基本会员 21 人。会议通过了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会章。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便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萧三等 18 人先后赴法勤工俭学。1936 年毛泽东对斯诺谈到了新民学会的情况，他说：“该会有七八十会员，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新民学会成员后来成为知名的共产党员的有罗迈（李维汉），现在是党中央组织部长；夏曦，现在红二方面军；何叔衡，任中央苏区最高法庭主席，后来被蒋介石杀害；萧三，作家，现今在苏联；蔡和森，中共中央委员，1931 年被蒋介石杀害；萧铮，党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与新民学会有关联的著名人物还有李富春、蔡畅、滕代远、李立三等。新民学会还介绍很多有志青年赴俄学习，其中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较著名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1918 年 8 月，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部分成员来到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京期间，他与蔡和森等人一起积极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10 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毛泽东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广泛接触多种新思潮。他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到杨昌济等人家去拜访求教，并组织新民学会成员在北京大学文科大楼听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讲演。毛泽东还结识了其他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1919 年 9 月至 1920 年 6 月，毛泽东及新民学会又发动和领导了驱张运动，毛泽东还曾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请愿。1920 年 1 月，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创办全国当时“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引起了……恐慌

1919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由于他知道北京等地的学生因中国外交失败而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毛泽东利用教员的身份，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接触，他约集所有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到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开了半天会。在会上，他对欧战后的世界局势，中国南北军阀的混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全国人心不安等情况

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全国人民逐渐觉悟的事实,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和说明。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深入到长沙各学校,并请来湘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等介绍北京爱国运动情况,并商定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他亲拟传单,动员青年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6月3日,他参与组织长沙20多所学校举行总罢课。在组织学生爱国活动中,毛泽东尤为注意讲演,宣传革命道理。他的演讲,语言生动活泼,手势又多,激动中带有幽默,人们非常喜欢听。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湖南学生爱国运动中,是一位最重要的组织者,湖南学生运动也是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开展得最猛烈的地区之一。

毛泽东还深深感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需要创办一种刊物,以扩大革命影响,提高群众觉悟,推动群众前进。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由毛泽东任主编。经毛泽东十多天的紧张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正式出版。其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创刊宣言》、《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好个民族自决》,以及随后相继出版的二、三、四期上的《民众大联合》等几十篇文章在省内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毛泽东的文章,无情地揭露和勇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热烈赞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意义,大力宣传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说明他正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湘江评论》由于它的精深议论,彻底无畏的战斗精神,清新明快的写作风格,一经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湘江评论》寄到北京后,受到李大钊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北京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专门予以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晨报》,上海《湖南》月刊,北京的《又新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成都的《星期日》等都全文或摘要转载。

《湘江评论》一问世,即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欢迎。创刊时印了2000份,很快销完。又重印2000份,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和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

《湘江评论》对湖南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其影响波及全国。由于它是全国当时“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引起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恐慌,在《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印出,尚未发行时,便被反动军阀查封,这更说明了《湘江评论》的影响和作用。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有些人只是一种“迷”

毛泽东与当时众多革命青年不同的特点是,在赴法、赴俄勤工俭学运动如潮兴起时,他决定留在中国,进行调查研究,这为他后来领导中国革命打下了掌握实际、熟悉国情的基础。

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青年出了国,他自己却留在了国内,这是为什么呢?对此他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①毛泽东又说:“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他还列出暂不出国的理由。对个人的好处是:“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 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②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我们可以从老革命家陆定一在半个世纪后所说的话中去验证。陆定一说:“毛泽东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区里,亲自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和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了解国情的过程。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74页。

② 同上。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半淞园为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送别会。这是与会者的合影。左4为毛泽东。

毛泽东送走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友,随后又推荐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此后,新民学会又创办了留俄勤工学团,从新民学会本身的发展和留法留俄的结果看,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建设输送了大量的骨干。其中很多人成了难得的治党、治军、治国的人才。

毛泽东参与创立和领导的新民学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及建设输送了人才,其成员也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章

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屡屡失败,人们期待着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终于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已在“五四”大潮中初露锋芒的青年毛泽东,一经确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中去。

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理论准备

1919年末到1920年夏,是毛泽东完成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性时期。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广泛接触,并大量阅读革命书籍,由此在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公正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经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一路风尘,于5月5日到达上海,与正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等人见面。毛泽东在沪期间,曾与陈独秀多次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



1919年底至1920年初,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在湖南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为此,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图为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与辅社同仁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起:3为王复生,4为毛泽东,6为罗章龙,7为邓中夏。

的书籍,以及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而陈独秀对毛泽东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则在毛泽东一生中关键性的时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当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逗留半年之后,于1920年7月返回长沙时,他已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于他本人,而且是对整个湖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后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他在北京、上海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以新思潮推进革命运动。于是,他立即请来新民学会的骨干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共同商议创办文化书社。

经过一番准备,毛泽东等17位发起人于1920年8月2日在楚怡学校召开文化书社成立大会,议决组织大纲八条,并推定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为筹备员。毛泽东起草了《文化书社缘起》,文章指出:“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岸的俄罗斯”,表明了对俄国十月革命新思想的向往和推崇。关于文化书社所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这样,文化书社从一开始便成为在湖南广泛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过程中,与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毛泽东请李大钊担任文化书社的“信用介绍”,沟通北京方面的出版机构;又请陈独秀担任“信用介绍”,沟通上海的有关出版机构;恽代英在武汉的利群书社也给予湖南文化书社很大支持。文化书社办得有声有色,仅据1920年9月至10月的统计,《新青年杂志》就推销了150份以上,《劳动界》也推销了130份,《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销售30份。文化书社还印制传单和书目,介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著作的中译本,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文化书社的影响和声望日益扩大。不久,文化书社又成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进行建党活动内外联络的秘密机关。后来李维汉曾经写道:“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又与何叔衡等人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作为派人赴俄学习考察的公开机构。在成立会上,何叔衡宣读了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研究会的会务是:“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以后,提倡以自学为主,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独到之处,并多次进行集体讨论,彼此交流学习心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研究会还派张一宗赴京,“随同京团体赴俄,备信两函,一介绍于俄国,一介绍于北京”。在研究苏俄,向往苏俄的氛围中,

毛泽东等人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把任弼时、肖劲光、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一批热血青年介绍给上海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随后到苏俄东方大学学习。他们中的不少人学成之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

发起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注意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东等人的革命活动,从思想上、干部上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建党工作的陈独秀已把长沙列入全国组党计划之内。1920年秋冬之交,陈独秀致信毛泽东,请他在长沙建立与上海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先后寄来上海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以及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毛泽东经过慎重的挑选,与何叔衡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由此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到这段经历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1956年毛泽东在填写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证时,在入党时间一栏亲笔写下了1920年的字样。

毛泽东在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还开始着手从事创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寄来的青年团章程和信件,请他在长沙发展团的组织。毛泽东开始从新民学会会员以及进步学生中,进行挑选,发展团员。关于毛泽东建团的活动,当时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学校的张文亮曾在1920年冬的日记中,有过真实的记录: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三)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